

確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持。但羅爾斯的整個理論也隨之發生了根本的轉變。例如原初境況便不再是一個價值中立的設計，它預設了一種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，即人應該致力發展成為一個自主、自律的道德人。當人擁有上述兩種能力時，人們是自由平等的，而這也是參與公平的社會合作的充要條件。他的兩條原則較效益主義優勝，最根本理由便是因為它能更有效地令這兩種能力

得到最充分的發展。亦因此故，他的假然契約論便不是他的整個理論的根本所在。因為這種對人的理解，早已先於契約被給定。而原初狀態的設計，恰恰要充分反映出這種對人的理解。但是，在多元主義的社會中，如何能在不訴諸任何形而上學的基礎上，證立自律是人最重要、最根本的價值呢？羅爾斯後期的政治自由主義，正正是希望能走出這種兩難的一個大嘗試。

美德多多的惡魔

● 劉洪波



(德) 古一多·克洛卜著，周健、彭志華譯：《希特勒的追隨者》
(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1999)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二十世紀人類史上最重大的事件。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國的興亡，極權主義及其意識形態的興亡，成了當代史學開掘不盡的主題。

1996年，德國出版了由歷史學家克洛卜 (Guido Knopp) 主筆的《希特勒的追隨者》(Hitlers Helfer) 一書。「沒有希特勒，第三帝國便是不可思議的。……但是光有這位獨裁者還不是第三帝國，他還需要那些完全聽命於他的幫手們。」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，他要發掘法西斯「權力的載體」，從而指出無條件的忠誠的危險性。

《希特勒的追隨者》只寫了六個人，他們是納粹主義煽動者戈培爾 (Paul J. Goebbels)、納粹黨的第二號

1996年，德國出版了由歷史學家克洛卜主筆的《希特勒的追隨者》，他要發掘法西斯「權力的載體」，從而指出無條件的忠誠的危險性。

人物戈林(Hermann W. Göring)、「解決猶太人問題」的執行者希姆萊(Heinrich Himmler)、希特勒的代理人赫斯(Rudolf Hess)、第三帝國的建築師斯佩爾(Albert Speer)、希特勒的繼任者鄧尼茨(Karl Dönitz)。因為巨大的罪惡，這些名字已經成了惡魔的符號，好像他們天生就是撒旦的使者。然而，如果不被巨大的仇恨與厭惡衝昏理智，可以看到他們原是普通的德國人，原本可能成為普通的推銷員、工程師、商人或者文字工作者，最終卻成為殺人機器上的最重要部件。

戈培爾出身於一個會計之家，幼年疾病使他右腿殘疾。他似乎是「身殘志不殘」的典型，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，並且終身鄙棄「拜金主義」。假如做一個普通人，他的缺點只是愛好女色。

戈林對職位與財富有巨大的興趣，但良好的家境使他養成精煉自信的舉止、予人好感的言辭，他一直熱誠追求「民族的自由」和「祖國的強大」。戈林對藝術品的收藏達到癡迷的程度，他甚至還是動物保護主義者，他說：「誰折磨動物，誰就是在傷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。」

希姆萊出身富貴之家，小時候「是一個連蒼蠅都不願傷害的小男孩」。他接受過良好的人文主義教育，辦事非常認真，從來不接受賄賂，總是嚴格地遵守法律，具有責任心、榮譽感、出眾的辦事能力和精打細算的品性。「誠實、正直、忠誠和友好」是希姆萊的座右銘。可以說，希姆萊簡直可以充作德國人的典範。

斯佩爾是個傑出的專業人才。按照中國人的理解，他是一個急於

有成的科技工作者，事業心強，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輝煌的建築。他對建築藝術的追求，達到狂熱的程度，只要「有用武之地」，並不在乎其他。

這些人美德多多，有些人更可謂「高尚」。然而，正是這些人成了希特勒最有效的幫凶，成了創造性地煽動仇恨、戰爭與屠殺的劊子手。所有的美德都起着放大罪惡的作用，而不是抵制惡行的因素。他們認準了「元首」，跟定了「元首」，忠心之下，美德變成了鑲在皮鞭上的鐵釘。如果希特勒倚靠的是流氓地痞，他終究不過是一個流氓頭子而已；倚靠着這些具有「良好素質」和「高尚情操」的奴才，他才真正能夠成為希特勒。

戈培爾信奉「民族，帝國，領袖」，他感戴領袖「重新教會我們古老的德國式忠誠」；戈林說：「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·希特勒」，「在希特勒身上實現了最深刻的邏輯思想家、真正透徹的哲學家 and 一個有着鋼鐵般意志的行動果敢的人的少有的統一，這是對德國的恩賜」；希姆萊評價希特勒：「他屬於那種每當全體日耳曼人陷入最深的肉體上、精神上 and 靈魂上的苦難時就將他們拯救出來的光輝人物」；赫斯發明了「元首」這個稱呼；鄧尼茨更是走火入魔，因為「和元首相比，我們大家都是非常可憐的無足輕重的人」，「如果我們沒有獲得元首，那麼德國現在已不再有人存在了」。按照「假如他不偉大，怎麼有那麼多人從心底裏熱愛他」的中國式邏輯，希特勒也該為得到這種東方式的理解而含笑於九泉。

按納粹黨的「黨性」，忠誠不僅意味着以黨的觀點去看待一切，更重要的是終身的行動。「叛黨」是不符合黨性，也不符合「忠貞不二」的人生信仰的。這便是法西斯極權主義政黨的邏輯對忠誠的理解。

按納粹黨的「黨性」，忠誠不僅意味着以黨的觀點去看待一切，更重要的是終身的行動。「叛黨」是不符合黨性，也不符合「忠貞不二」的人生信仰的。「如果我立下效忠的誓言，我是不可以違背誓言的」(戈林)，「誰對着旗宣過誓，就不再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了」(希姆萊)，「信念上的忠誠意味着無條件的服從，這是一種不過問命令的用處和理由的服從，是為服從而服從」(赫斯)，這便是法西斯極權主義政黨的邏輯對忠誠的理解。

深知「人民群眾其實是女性」的戈林，致力於「把人們改造到我們滿意為止」，為此他重組了國家的新聞體制，電影、廣播、戲劇、藝術、音樂和新聞開始了一場「國家廣告戰」，對「壞作品」的焚燒被神聖化了，「宣傳的秘密(又叫藝術)」被不斷發掘。其哲學洞察力被用於發現宣傳對象的弱點，以便於人們更相信「猶太人是垃圾品」。為了消滅「有人對猶太人表示同情」這種表明「民族簡直還不成熟，充滿愚蠢的多愁善感」的現象，戈培爾甚至導演了「自動爆發的民族憤怒」，以證明「猶太人遭受着雖然艱難，但比他們應得的要好得多的命運」。這命運便是「即使德國軍隊將來不得不撤退，在它後撤的道路上也要把這世上殘留的最後一個猶太人消滅掉」。

希姆萊說，「如果沒有必要，我們將永遠不會變得殘忍和冷酷」。他舉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作為例證：「我們德國人是世界上唯一對動物態度公正的人」，他指的是戈林頒布的「不得折磨動物」的法律。然而，因為第一，「那個有手有腳、有大腦、

有眼有嘴的從生物學上看起來和我們完全同類的自然創造物」，是「人類中的殘渣」，「在思想上、精神上比任何動物都要不如」；又因為第二，這個民族還「要殺死我們的民族」，從而危害「法制的前提和基礎，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權」；所以愛護動物的德國人有必要拿猶太人做活體解剖和極限試驗，更有「道德上的義務」來清除這些不過「和乾淨整潔有關」的「虱子」。

希姆萊受過良好的人文主義教育，他知道應該消除殺人者的精神痛苦，預防殺人者產生內疚感和心靈不安。希姆萊的情調還表現在集中營的管理上，集中營的門口書寫着「勞動使人自由」的標語，他將殺人賦予詩情，「自由」與「死亡」的雙關令人寒毛倒豎。他如此使用他的「節約」美德：「用盡量少的費用殺死盡可能多的犧牲品。」他是「理想純潔」的人，殺人之餘，「我不要去看到這裏(集中營管理機構)哪怕只有一處小小的腐敗的地方」。他要保證「殺人的純潔性」，希望殺人與「個人恩怨」無關，便永不承受心靈的責難。正如中國人熟悉的「集體行賄」或「文革」這種巨大的災難，因為「出發點不錯」，就不值得反省。

技術人才斯佩爾對於中國人來說尤其不會陌生。「只要希特勒要求將一處建築的長度定為150米，斯佩爾肯定會加以反駁。他的反對意見是：200米，我的元首！」他深刻理解納粹主義的「思想實質」，導演的納粹儀式總是具有強大的感官衝擊力。斯佩爾奉命設計世界之都「日耳曼尼亞」，他曾說：「我當然完全清楚

希姆萊說，「我們德國人是世界上唯一對動物態度公正的人」，所以愛護動物的德國人有必要拿猶太人做活體解剖和極限試驗，更有「道德上的義務」來清除這些不過「和乾淨整潔有關」的「虱子」。

希特勒的追隨者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煉着無限制的忠誠、「黨性」的品格，然而所有這些美德都不過充當了獨裁者的工具。所以，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類道義之上，建立在對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礎之上，都可能充當極權統治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基礎。

他是在追求世界統治權。……這是我建築的全部意義。……我的全部打算是針對這個偉人將統治整個地球。」他只管完美的「藝術實現」，而不在意這種藝術到底是為着甚麼，正如一個歌唱家只要唱出最美的聲音，卻不管在歌唱着甚麼，他只是要讓人感動，並視之為藝術的高峰。這樣的專業人才是獨裁者最有力的幫手，有的發明機器，有的唱着頌歌，有的築着靈寢，有的成為幕賓，各各以助紂為虐的方式實現「人生價值」。

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希特勒的追隨者們喪失了善惡美醜的判斷，如

果那樣，他們就是一些有「特殊秉賦」的人，這樣的人固然可怕，但畢竟也是「不可多得」。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煉着以無限制的忠誠、「黨性」打頭的品格，在堅守勤奮、紀律、節儉、服從、愛國、熱愛自然等一般道德上無可挑剔。然而，他們信奉的最高準則卻並非人類的公義與良心，所有的其他美德都不過充當了獨裁者的工具。

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類道義之上，建立在對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礎之上，都可能充當極權統治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基礎。

失敗者之歌

● 靳樹鵬



王觀泉：《被綁的普羅米修斯——陳獨秀傳》(台北：業強出版社，1996)。

成功者未必偉大，失敗者未必貌小。

陳獨秀是政治上的失敗者，他領導的大革命失敗了，他曾任總書記的中國托派失敗了，終至寂寞而死，但是關於他的論著卻日漸增多。據筆者有限的聞見，近十多年來有關他的傳記和年譜就出版了十多部，其中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